姓氏溯源

南宋宁宗时权参知政事俞应符为五峰俞氏杭派之后裔

从《嘉兴路儒学教授俞君墓志铭》证实：

俞强 俞建文

最近我们在《四库全书》元代刘岳申的《申斋集卷九》中，找到了一篇《嘉兴路儒学教授俞君墓志铭》，证实南宋宁宗时权参知政事俞应符为五峰俞氏六世祖俞稠之玄孙俞伯英长子、北宋殿中侍御史俞宗古之后裔。

现在我们首先来看这篇《嘉兴路儒学教授俞君墓志铭》：

延祐科兴，余往来涂，学几亡诵弦声。元统壬申（1332年），浙俞镇伯贞以教授来涂，士稍集然，每试得士，又如未尝废业者，邻州县往往亦响应。伯贞与余游间视余，以其父嘉兴教授圹志请铭。乃伯贞以延祐丁巳（1317年）魁乡贡，至治癸亥（1323年）季弟锐亦贡，皆家教也。俞氏以吴越睦州刺史稠，世家汴，至宋殿中侍御宗古始家杭。曾祖宋迪功郎讳应龙，从兄枢密文惠公应符，尉嘉兴府棠德县，始家县南南津乡通贤里，祖讳儒宗，考讳国梁，君讳天民，蚤擅词赋，尤工骈俪。至元丙子（1276年）大疫，大父、父不幸俱至大故。祖母刘维卒，君奉母梁夫人治丧，终丧而家事益治，始迁县甘泽坊，为奉亲教子。地翰侍讲学士邓文源善之，其久交也。君遣子镇等从之学，家素寒而喜宾客，尤睦族，姻下帷友教诸弟子以乐其贫，历主一永嘉两书院长，以嘉兴路儒学教授致仕，命未下而卒，至顺庚午（1330年）三月也。年七十有三。娶徐氏先卒，子男五：镇、楙、钓、佳、锐。楙、佳先卒，锐，衢州路儒学正。女三：婿葛瑛、陆其、杨祖。孙男四，女十二。往岁宋亡故家世族多流落，君侍御、枢密之后，能家教不随子孙与科俱兴，身教可知已。镇以至顺癸酉（1333年）合葬其考妣通贤故里。铭曰：

繇汴徙杭，繇杭徙越。迁国以亡，兴家以勃。侍御之世，枢密之家。通贤里第，有韡棣华。惟志尹甫，教子世科。我碣其藏，华山其阿。

这篇墓志铭写于元延祐年间，俞镇在与刘岳申交往期间，以其父嘉兴教授圹志，请刘岳申为其父嘉兴教授俞天民撰写墓志铭。据《正德崇德县志》载：俞镇，字伯贞，早承父天民训讲朱辅之学，长受业于邓文原（1258年—1328年），通五经，尤精于易，为文一本经义，延祐丁巳领乡荐第一，由教授历典湖广，江西，江浙文衡官，至建德路知事，以文学显于世，得其指授，悉为闻人。扁斋居曰：学易门人称为学易先生，有修词稿二十卷行世。俞镇不仅文学好，书法也有名，据《书史会要》：俞镇，[元]字伯贞，嘉兴（今浙江嘉兴）人。官至建德县尹。行草师李邕。

墓志撰写者刘岳申，字高仲，吉水人。以吴澄荐，召为辽阳儒学副提举，不就。后授泰和州判，致仕。《申斋集》乃其门人萧洵所编，李祁为之序。元季尝付剞劂，久经兵毁。顾嗣立《元诗选》罗至备，独不及此编。《江西通志》亦谓“岳申文集今已不传”。

墓志铭所记述的俞氏世系信息非常重要，结合《大晦俞氏谱》及其他文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俞镇之父俞天民的祖源和世系记载得非常确切，这一支俞氏祖源为五峰俞氏六世祖、唐懿宗时为睦州刺史的俞稠。

2.世家汴，即世代居住在汴梁（今河南开封）由北宋殿中侍御史俞宗古时始迁杭。

3.俞天民的曾祖为南宋时的迪功郎俞应龙，在为嘉兴府崇德县尉时始迁县南南津乡通贤里。

4.俞应龙的从兄为南宋宁宗时权参知政事俞应符。

5.俞天民的祖父俞儒宗，父亲俞国梁。

关于俞应符，《宋史卷二百一十三表第四》载：

“1221十四年辛巳史弥远 八月乙丑，追封史浩为越王。八月壬戌，宣缯自兵部尚书除同知枢密院事。俞应符自给事中除签书枢密院事。闰十二月辛巳朔，宣缯兼参知政事。俞应符兼权参知政事。八月乙卯，任希夷罢枢密院事及兼参知政事。

1222十五年壬午史……政事。程卓自给事中除同知枢密院事。薛极自吏部尚书、赐出身除签书枢密院事。六月辛卯，签书枢密院事俞应符卒。”

俞应符，宋宁宗时，自给事中除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其职位相当于副宰相。

刘岳申的《嘉兴路儒学教授俞君墓志铭》，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为研究五峰俞氏世系、特别是杭派俞伯英支世系，提供了珍贵的信息。但因该文作于元统壬申（1332年），在世祖溯源上产生了两个明显的错误：

一是将五峰俞氏始迁祖俞稠任睦州刺史的时间误为“吴越”。根据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五峰明派斑竹俞氏十四祖俞景福（伸）主撰的《大晦俞氏谱》（后由俞浙誊录在五峰俞氏“金字谱”中）记载：俞稠为五峰俞氏始迁祖，四个儿子：珣、琄、玢、玗分别为剡、杭、汴、明4个支派之祖（详见另文）。结合由北宋大臣张方平撰写的《赠宋贤妃俞氏墓志铭》：俞稠和俞琄长子俞承逊，祖孙都做过睦州刺史。俞稠是晚唐懿宗之时，其孙俞承逊是在五代时的吴越国。这篇墓志是把俞稠祖孙任职的时间混淆了。

二是将杭派和京派（汴）搞混了。据《大晦俞氏谱》记载：俞稠三子俞玢做过汴梁副使，为京（汴）派始祖，生二子承通、承美。承通生二子仁贤、仁恩，承美生一子仁，这一支就在汴梁繁衍了。该墓志提到世家汴，是把世系从杭派误接到京（汴）派了，虽然同为稠公之后，但支派接错了。墓志中提到的他的北宋的先祖俞宗古是俞琄次子俞承拱之孙，为五峰俞氏杭派十一世祖。根据《大晦俞氏谱》：俞宗古生七子：世绶、世结、世總、世约、世绍、世縉、世续、世纬，曾孙有六，谱中记载：俞希、俞昇、俞篪、俞植、俞九龄，为十四世祖。不知应符、应龙出于哪一支？在俞应符之前，大概有五、六代没记载。根据宋史、墓志与大晦谱的时间推算，俞应符大概在二十世到二十一世之间。

湖州乌程俞氏尊俞应符为始祖。查据有关文献资料：乌程，古县名，在今浙江湖州。公元前223年，秦朝时期改为菰城为“乌程”，以乌巾、程林两氏善酿得名。历史沿革属会稽郡。治所在下菰城（湖州城南二十五里的云巢乡窑头村，始建于战国楚考烈王十五年即前248年）。有乌程氏居此，故名。汉因之。东汉永建四年（129年），分原会稽郡的浙江（钱塘江）以西部分设吴郡，乌程属吴郡。晋移置，宋以后因之，明清时与归安并为浙江湖州府治，民国废并为吴兴县。

据明朝董份撰写的《明故南京高桥门千户所吏目西野俞君墓志铭》记载和姓氏研究者龚肇智研究墓志的文章：以俞西野为代表的乌程俞氏是明代湖州俞氏的一个家族。但董份撰写的铭文，这支俞氏从何地、何时迁来湖州？都不甚清楚，只知道这支俞氏到明代时已居湖州乌程县。乌程俞氏始祖俞应符，宋之佥书枢密事，其子俞兴，为四川制置使，知重庆府。俞兴子，俞如珪。俞如珪子俞俊，俞俊子俞缙，俞缙子俞叙，俞叙子俞谔。俞谔即俞西野之父。俞西野字汤和，湖之乌程人，为俞谔长子。官至南京高桥门千户所吏目。嗣子锡。女四。

所以，以俞应符为始祖的湖州乌程俞氏，与俞应符堂弟俞应龙为始祖的嘉兴崇德俞氏，同为五峰俞氏杭派始祖俞琄次子俞承拱曾孙、北宋殿中侍御史俞宗古的后裔。现根据俞天民的墓志，可以基本确定，乌程俞氏也迁自杭。

红色之光

陈克寒：新闻界的杰出代表

方印华

1980年7月30日，北京中山公园的中山堂内，陈克寒同志的追悼会正在隆重举行。追悼会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主持，北京市委第三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贾庭三致悼词。参加追悼会的有中央领导人李先念、万里、胡乔木、姚依林，北京市的负责人叶林、王纯、毛联珏、李立功、王宪，有关单位的负责人朱穆之、黄镇、邓力群、曾涛、胡绩伟、穆青等，陈克寒同志的生前友好和北京市干部群众代表共七百多人。

陈克寒是慈溪县慈城镇人（今属宁波市江北区），1917年7月出生于上海。15岁时，中国的东北被日本军国主义侵占，接着又在上海发生了“一·二八”事变，日寇的种种侵略行径在当时年轻人的心中激起了无比的愤慨。陈克寒也和许多爱国青年一样，从心底里萌生了报国的志向。就在此时，陈克寒结识了有着同样报国情怀的一群年轻人，如王玉清、齐速、汪家为、周天宝等，共同的志向使他们很快成为了好朋友。当时，国民党对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迫害已经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大批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被逮捕或杀害。在此严峻的形势下，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在上海共同发起和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推举宋庆龄为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杨杏佛为秘书长。他们发表宣言，要求当局释放政治犯，废止非法拘禁、酷刑、残害革命人士等暴行，给人民以民权保障和充分自由。民权保障同盟的成立让陈克寒等人看到了希望，于是就把位于上海八仙桥的民权保障同盟当作了心中的向往之地，经常去那里聆听演讲。令陈克寒没有想到的是，这里还有一个青年会，在青年会中还有一个秘密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通过与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频繁接触，使这些心中迷茫的青年逐渐认识到，要改变中国的命运，只有积极投身其中，才能获得美好的明天。心中有了明确的目标，行动才有坚定的方向。1934年，陈克寒经人介绍加入左联，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他以一个革命者的坚定信念和大无畏的精神，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作为一个秘密党员，陈克寒的日常工作主要受中央特科指派。1935年12月，他再次受命，跟随陈昌从事新四川通讯社的筹建工作。这个通讯社是1935年8月由陈昌牵头筹建的，但在筹建过程中因为受到种种干扰和技术上的困难，进展缓慢。陈昌不得已回到上海，向中央特科汇报。经过一番慎重考虑，中央特科决定派陈克寒一同前去。林向北在《“三陈”闹四川，陈昌是主角》一文中曾详细披露了他们创建新四川通讯社的过程（见2017年4月10日的中华儿女新闻网）。这“三陈”指的就是陈昌、陈养山和陈克寒。陈克寒与陈昌一起从上海乘坐轮船沿长江溯流而上，到重庆后即着手组建新四川通讯社。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普通的商业性电台，而实际上是根据中央特科的指示从事情报工作。在重庆期间，陈克寒的公开身份是该通讯社的首席记者，但实质性的工作是以记者的名义通过采访国民党的各级官员，从中获取相应的情报。这也是陈克寒从事新闻工作的一个起点。由于他的工作热情高，文字功底较好，使这家刚成立不久的通讯社很快成为川渝地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新闻机构。

大约在一年以后，红色中华通讯社随红军到达陕北后，便准备建立西安分社。因为急需新闻方面的人才，陈克寒调到了西安工作。在此期间，陈克寒还受命去福建和上海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参与了《解放》周刊的创办。1937年1月，经中央决定，红色中华通讯社更名为新华通讯社，陈克寒被调到延安新华社总部担任记者。后来，丁玲等在延安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陈克寒还担任了通讯股股长。1938年1月1日，《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张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陈克寒被调任《新华日报》驻华北特派记者，负责华北地区的报道工作。同年7月，因日寇准备大规模进攻武汉，报社一方面准备转移，另一方面还与有关部门协商，准备出《新华日报》西北版。然而，国民党当局却以种种借口予以阻挠。就在此时，朱德总司令刚好路过西安，闻听后当即表示“不让出，你们就到华北去，华北军民欢迎你们”。经中央和长江局同意，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何云同志负责到太行区筹备《新华日报》华北版具体工作。1939年1月1日，在山西沁县正式出版，是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为加强党对报纸的领导，还专门组建了一个党报委员会，其成员有杨尚昆、彭德怀、左权、陆定一、傅钟、李大章、何云等。陈克寒也因《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办刊需要而调到报社工作，担任副总编，同时也是党报委员会的成员之一。

“一个铅字等于一颗子弹，在敌后办报就是无形的战斗。”曾全程参与《新华日报》华北版创刊的山西日报社离休干部房秉玉老人说，何云的这句话，形象地反映了《新华日报》华北版火线办报的情况。在激烈的反“扫荡”中，何云和陈克寒带领大家“背起报馆打游击”。他们将工人和编辑人员编成连队，荷枪实弹，一面跟鬼子周旋，一面设法出报。他们组织大家把铅字改小，制造了小型轻便的活动铅字架和小型脚踏机、轧墨机、浇版机，连同电台、纸张、油墨，只借三匹骡子即可驮走。因此，在炮火连天的艰苦岁月中，《新华日报》华北版从未中断出版。遇到战斗紧张时，何云与陈克寒便在吃饭休息间隙，命令报务员架起电台，收听电讯，不能铅印，就出油印战报。

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何云随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奔赴前线，组织战地新闻采访，在火线上编辑、审稿、刻印、发行，以最快的速度把战斗消息传播出去。在关家垴战斗中，何云紧跟彭德怀副总司令，利用号外形式，大力宣传战斗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及时报道揭露了日寇推行“封锁”“蚕食”“治安强化运动”的罪行，成为鼓舞和激励人民对日斗争的响亮号角。朱德总司令曾经给予高度评价：“一张《新华日报》顶一颗炮弹，而且《新华日报》天天在作战，向敌人发射出千万颗炮弹。”也正是有了如此大的威力，令日寇对《新华日报》恨之入骨。从1942年5月19日起，三万多日军开始疯狂扫荡太行山北侧，目标直指八路军总部和《新华日报》华北分馆。23日，部队转移至南艾铺村时被敌人重重包围，何云决定分三路突围。他带领编辑、报务员等10人准备去找大部队坚持出报，副主编陈克寒带着10名记者向太行山以南突围并随军采访，编委史纪言带领房秉玉等60人就地打游击。在这次的“铁壁合围”“梳篦式”扫荡中，左权将军牺牲了，何云等46位新闻战士也牺牲了。为使报纸出版不受影响，经上级决定，陈克寒任社长兼总编。

1942年7月8日，在河北省涉县郭峪村西山腰的一座石庙里，隆重举行了何云等烈士的追悼会。新任社长陈克寒号召大家化悲痛为力量，用实际行动为烈士报仇。9月1日，青年记者学会延安分会举行追悼何云及全体新闻界殉国烈士纪念会，时任北方局书记的杨尚昆到会报告何云生前的英雄事迹。《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了邓拓《哭何云同志》的挽诗：“文章浩荡卫神州，血溅太行志亦酬。党报事艰来日永，同侪心痛老成休。云山遥祭挥无泪，笔阵横开雪大仇。后死吾曹犹健在，不教胡语乱啾啾。”（以上见记者邢兆远、李建斌的报道“文章浩荡卫神州——忆英烈何云和《新华日报》华北版的抗日报道”，原载2015年9月3日《光明日报》）

在陈克寒主持《新华日报》华北版两年多的时间内，他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关于宣传工作的方针和政策，使报纸的质量和发行量稳步提升，无论是根据地的人民还是抗日战士，都把这份报纸当作了学习时事政治的重要平台。同时，对于国民党军队还是日本侵略者而言，这份报纸犹如一柄锋利的匕首，刺得他们浑身难受，坐立不安。比如，在对新区宣传和争取知识分子等工作方面，陈克寒曾专门向中央写过一份报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后来中央专门对这份报告作了批示，并要求转发各局、各分局和各前委。同时中央明确指出：

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是我党重大的任务。为此，要办抗大式的训练班，逐批的对已有知识的青年施以短期的政治教育，要大规模的办，目的在争取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受一次这样的训练，训练后，因才施用，派往各种工作岗位，再在实际工作中去锻炼。对于原有学校，要维持其存在，逐步加以必要与可能的改良。所谓要维持其存在，就是每到一处，要保护学校及各种文化设备，不要损坏，要迅速对学校宣布方针，并与他们开会，具体商定维持的办法，否则大批学校就要关门，知识分子会被敌人争取去。所谓逐步加以必要与可能的改良，就是在开始时，只做可以做到的事，例如取消反动的政治课程，公民读本，及国民党的训导制度，其余一概仍旧，教员中只去掉极少数的反动的分子，其余一概争取继续工作，逃了的也要争取回来。各中央局应将自己辖区内这项工作的情形及经验，向中央报告（该电文现存中央档案馆）。

1940年12月，由于形势的发展和宣传工作的需要，新华社专门设立了广播科，首任科长李伍。1943年秋，陈克寒回到延安，在新华社担任记者；1944年年底，接替李伍任新华总社广播科科长。抗战胜利后，陈克寒先后担任了新华总社第一副社长兼副总编、中共中央中原局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中原分社社长、中原大学新闻班班主任等。1948年冬，他再次回到新华社。当时的新华社跟着中央机关一起流动，所以他也在西柏坡学习工作了一段时间，依然任新华社副社长兼副总编。北京和平解放后，新华社跟随中央机关一起来到北京。由于全国解放在即，为更好地做好宣传工作，根据中央提出的要求，新华社的一些领导成员留在西柏坡进行了短期培训。就在此时，九三学社发表了一个对时局的宣言，表示坚决拥护共产党，坚决反对内战。同年8月5日，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发表通电起义。对于这两个重要事件，新华社没有及时报道。为此，周恩来专门找来陈克寒和吴冷西，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谈话，并要求他们认识到新华社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无论是作报道还是写评论，都要记住新华社这个身份。在当时的形势下，特别要考虑和照顾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要充分体现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要充分尊重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周恩来的这一番讲话，令陈克寒茅塞顿开，成为了他后来工作中的最高标准。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成立了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陈克寒先后任新闻总署党组副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处处长、出版总署副署长、署长、党组书记。当时的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隶属于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1954年11月，新闻出版体制进行了调整，新闻与出版合二为一，成立了出版事业管理局，隶属于文化部。陈克寒调任文化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分管新闻出版工作。在文化部工作期间，为繁荣中国的出版事业，陈克寒尽心尽职，做了大量工作。为了加快对古旧书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文化部多次召开座谈会，征求各方面意见，以利于政策的制定。为畅通出版发行的渠道，1956年9月，陈克寒指示新华书店总店和国际书店总店联合召开全国图书发行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对那些在发行工作中成绩突出的书店和个人予以表彰。1958年3月，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陈克寒到会并作了讲话。同年9月，陈克寒调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这一调动的原因是，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中央非常重视这次庆祝活动的安排，除了大会庆祝、邀请外国来宾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阅兵式外，还要求北京市政府能安排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陈克寒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调到北京市委工作的。为了顺利完成任务，他亲自出马，去各个文艺团体动员。节目上报以后，他又亲临排练场，对节目逐个审查。正是因为陈克寒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使国庆10周年的文艺专场好评如潮。1962年6月，北京市委领导班子换届，陈克寒仍任书记处书记。1966年5月，北京市委改组，李雪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高扬文、郭影秋、陈克寒、万里、赵凡任书记处书记。然而，仅仅过了5个月，突然宣布撤销陈克寒、万里、赵凡书记处书记职务。从此，陈克寒被卷入了无休止的批斗之中。他实在不明白，造反派为什么一定要把那些不实之词强加于他的头上？他曾经服过安眠药以求解脱，但被救了回来。在商学院学生批斗他时，性格刚烈的陈克寒竟然纵身从两楼跳了下来，从此留下了终身残疾。

1977年11月，陈克寒当选为政协北京市第五届副主席，但他已经无法正常工作了。1979年12月，在北京市第七届人大常委会会议上，陈克寒被任命为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有关陈克寒所发表的作品，目前能够找到的有：《八路军学兵队》，这是由《战地生活丛刊》第8期刊印，时间是1938年。这本小册子共11章，72页，是专门供新加入八路军的战士学习的。《模范抗日根据地冀察晋边区》一书，1939年由《新华日报》馆印行，共126页。这本小册子被认为是为抗日根据地研究提供了最珍贵的资料。《游击生活三个月》发表于1938年8月12日的《新华日报》上，主要介绍了晋西某游击队与敌人作战的经历及其机智勇敢的作风。也正是因为这篇文章，陈克寒被称为全面报道抗日根据地第一人。1951年由湖北省委宣传部和共青团中南工委宣传部联合印发的《我们的祖国》一书，有3篇介绍祖国的文章，在附录中收入了金灿然、丁易、钱伟长、周恩来、陈克寒、胡绳、于光远等人的文章7篇，人民日报社论一篇。就在陈克寒重病缠身时，还在为《人民日报》撰写《把首都建成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的优美清洁城市》。

1980年7月10日，陈克寒在北京逝世，享年63岁。

慈溪家谱

民国《孝义傅氏宗谱》

童银舫

《孝义傅氏宗谱》六卷首一卷末一卷，十八世孙宗长傅之清（东五）主修，十九世孙傅赞善（鹿芩）编纂。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永锡堂木活字本，6册。版心、目录、卷端题“余姚孝义傅氏宗谱”，书衣题“余姚孝义傅氏谱”，书名页题“孝义傅氏宗谱”。共印12部，以“清河泽孝义风耕读传礼乐备”12字编号，上海图书馆藏“耕”字号。

卷首序、凡例、渊源考、宗统说、原序，卷一族规、族箴、谱例、祭祀说、祠录汇编、筑圩记、创建宗祠名录、筑圩名录、助产名录、创辑宗谱名录、藏书谱名录，卷二先贤列传、宗贤列传、节孝传，卷三排行韵语、历代世系图、孝义总世系图、大房世系图，卷四、卷五为二房世系图，卷六为三至六房世系图，卷末跋。世系记止二十六世。

傅赞善在《序》中叙述编此谱有三难：一、其年已七十，独力难支；二、经费寥寥；三、各房资料多寡不一，有的难以详尽。但“所以知三难而勉强之者，诚以谱之贵世系的真，不在序记传赞之佳，而在世系之无漏无混”，可谓中的。因此，他在编纂此谱时，有破有立。如《凡例》中云：“谱家多图历代遗容于卷首，其实如在之诚原不赖此，更弗论其果克肖像否也，故不载”“古人十五岁以上方入谱，今无大小皆许续载。盖古人十年一修谱，今人多逾数十年一修，恐久而遗失难续也”“谱于已故者，书善不书恶，隐扬之道也。生不作传赞，盖棺论定也”等。

此谱以北宋傅继宗（1008年—1068年）为始祖，由清河郡迁居曹州府郓城，金人灭宋，裔孙南迁越中。十一世孙绍一（1298年—1359年），字龙泉，号公仁，元末自余姚龙泉乡迁居邑之孝义乡，为始迁祖。《渊源考》云：“……澄公生端七、端九二公，徙余姚西门外傅王桥，又迁东横河龙泉乡。端九公生绍一、绍二二公，分东西宅。又迁于斯，聚族而居，名曰傅村。族大蕃衍，耕读传家，恂恂如也。”至六世，分为七房。惟七房子孙辈出外不归，无传。六房记止十六世，迁居松江华亭县廿二都，查访无着。

宗祠永锡堂初建于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后在康熙三十六年、嘉庆二年、民国十七年又作改造和增建。

族箴十则，录其主旨如下：一曰孝亲，二曰敬长，三曰尊祖，四曰睦族，五曰贵勤，六曰崇俭，七曰劝善，八曰惩恶，九曰务本，十曰息讼。

阖族排行。光绪谱编者傅善行在“引言”中说：“我族向无谱乘命名，舛差不一，乃编四言韵语二十八句，自宋始祖继宗公至七世端九公止，复以绍一公为迁姚孝义一世祖起，依此补填行某字样。”但世次与历代世系图不合，从历代世系图所记，继宗至端九为十世，并非七世。此排行歌中，“继宗”为始祖，“尧俞”为二世，“绍”字为孝义第一世，如此排行，极为特殊。全文如下：

“继宗尧俞，公自伯建。端绍聪明，彰礼宗诗。永应大正，孟仁天一。毓国之善，于万斯年。群生厚载，通经达权。齐民观化，遐迩声传。熙昭寰宇，瞻希圣贤。英伟敬业，哲嗣肇先。身临芳范，彝伦长绵。春华秋成，用宏体全。贻猷丰懋，纪绩鸿宣。若金作济，念典泽延。云礽咸集，孝友心田。联登攸序。”

孝义傅谱，首创于清康熙辛巳（1701年），为抄本，傅国忠（起岩）、傅本初（省存）编纂。咸丰甲寅（1854年）[一作同治丙寅（1866年）]续修，亦为抄本，傅焕章（耐斋）编纂。光绪戊寅（1878年）续修，也是抄本，傅善行（小墅）编纂。民国谱为四修本，首次刊印。

按，《中国家谱总目》著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藏有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木活字本，编修者作傅鹿苓，均误也。民国谱卷末傅赞善《跋》云：“溯我始祖绍一公自迁孝义以来，迄今已历二十余世矣，而谱牒则慨（憾）阙。然迨前清康熙间起岩、省存二公创始修辑抄谱，咸丰间焕章公续修之，光绪间小墅公又续之，莫臻大备，未克付梓。”可见光绪谱并未刊印。其实历史所收藏的也是民国谱，编者署“十九世孙鹿苓赞善总辑”，非“鹿苓”也。

本版投稿邮箱 939901613@qq.com

社址：慈溪市新城大道北路288号 邮编：315300 职业道德监督电话：58997275 发行咨询电话：63033658 广告经营许可证：3302004023005 零售：每份1.50元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慈溪日报报业有限公司印刷